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凉山扶贫对策的研究*

景志明,王堂尧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本文通过对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及其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核心内容和教育方式的阐述,挖掘其平教思想与乡建运动目标“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和意义,探寻其平教思想与乡建运动的“四大教育”核心理念和“三大教育方式”的实践经验,及其对当代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并对凉山州扶贫工作的历程、现状、成绩及其扶贫政策和扶贫模式进行梳理,探讨凉山州落后地区脱贫困难的原因,借鉴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及其乡村建设实践的宝贵经验,针对凉山的实际情况,提出以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为主线,突出教育文化、基础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配套的扶贫对策和具体措施。

【关键词】晏阳初;平教思想;凉山扶贫;扶贫对策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4-0075-08

在上世纪初兴起的国家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国家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就是乡建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开创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上的定县、邹平、北碚三种实验模式,其乡建思想对当时乃至今天的新农村建设运动都有久远的影响和意义。

在近代百余年来“屈辱自强”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建设正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及其衍生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产物与对应物。其同步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某种“另类现代性”。(潘家恩,杜洁,2011)这场自发于民间——到政府参与——最后由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正是中国近代以来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线索。现今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及其落后地区的扶贫工作,虽然时代不同,但都可以溯源追索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肇兴的这场乡建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其乡村建设实践的宝贵经验对当代的新农村建设及扶贫工作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其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践

晏阳初(1890~1990)(吴相湘,2001)是一位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的教育家,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是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理论的创立者和实践者。尤其是在定县的乡村改造实践,使他成为名扬世界的教育家。

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1913年入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政治系学习,191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1918年赴法国战场为华工服务,期间创办华工识字班,开始了他的平民教育事业。1920年,结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业,回国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8月,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总干事主持实际工作。1926年晏阳初及其同仁决定以河北定县作为实验研究的中心,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验。1929年,晏阳初举家迁居定县,平教会总机关与全体成员及家属也同时迁往定县。由此,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逐步完成了由识字运动到全面乡村建设的重大转折。在“定县实验”期间,鼎盛时期约有600名知识精英分子,包括许多博士、教授、大学校长,他们经过艰苦的探索,成功地开创了以平民教育思想为指导的用教育改造社会的“教育—乡村改造”定县模式道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定县沦陷,实验工作被迫停止,晏阳初前往长沙,在湘西南继续进行乡建实验。1940年,晏阳初在重庆成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担任院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院扩充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成为平教总会的工作中心。1949年11月,晏阳初赴美定居。从五十年代起,他致力于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开始把他在国内实践乡村教育事业的经验移植到世界各地,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地,为他的平民教育思想与乡村改造事业奔走,在世界范围内继续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郑杭生,张春,2004)。

(一)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乡村建设实践的目标

晏阳初认为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三C”即孔

收稿日期:2012-06-20

*基金项目:是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2012年课题《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凉山扶贫对策研究》(编号sxjzx2012-017)。

作者简介:景志明(1956-),男,西昌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研方向为民族教育和思想政治

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中国传统文化濡染使他形成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韦政通,1984)的民本思想;晏阳初早年加入基督教,在西方受过良好的教育,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早年在法国战场华工服务中心的工作经历,让他对中国农民的智慧有了深刻的认识,使他认识到在农民身上潜藏的他称之为“脑矿”的巨大潜力,也因此坚定了他终身从事平民教育的信念和决心。他怀着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力图通过改造中国农村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努力探索拯救中国的一条新路。

晏阳初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使命就是“民族再造”。1937年他在一次历史回顾中明确地指出乡村建设的使命不是“农村救济”或“办模范村”而是“民族再造”。乡村建设运动不是偶然产生的,它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他认为中国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那么对于其他一切问题的努力和奋斗,结果都将是白费气力,自做牺牲,乡村建设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兴起的。平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平民成为有聪明才智和有进取心的中华民国公民,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目的不仅是教成千上万个文盲去读书,而是把他们训练成为现代的公民,从而达到民族再造的社会改造目的。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从平民教育开始的,最后上升到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基层建设。在乡村社会基层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教育服务于乡村改造,通过乡村的整体改造与建设来开发和实现人的无限潜力和弘扬人的个性,重建新人格。这种通过教育和在乡村改造过程中培养人民的创造力、组织力、建设能力的理论,是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的精华。在这一点上,晏阳初已经认识到了,要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是首当其冲的。周建波,马亦欣(2010)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人力资本理念与中国农村状况相结合的一次温和的改良主义实践,其思想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对我国当代继上世纪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新乡村建设”运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样,对我们在探讨当代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开展也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晏阳初的“民族再造”思想即“人的现代化”问

题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总根源,也就是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是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乃至国家国弱民穷的治本之法。阿玛蒂亚·森(2001)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他对收入分配引起贫困问题的解决核心思想是:“扩展自由被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2006)自由不仅仅包括基本的经济生活的物质保障权利(如失业者有得到救济的权利,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者有得到补助的权利等),也不仅仅扩大到基本的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权利,更扩及到基本的教育文化权利(每个孩子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总之,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阿马蒂亚·森认为这个“可行能力”的内容不仅包括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和物品,而且包括这个人使用这些权利和物品的能力(周丽莎,2011)。因此,国家再分配的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给低收入阶层适当的收入方面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为提高他们的能力创造适当的条件,以便使他们最终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靠永久的帮助、甚至是连续的施舍来摆脱困境。

(二)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乡村建设实践的内容与方式

姜荣耀(1995)认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是根在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并将晏阳初的国民教育思想简洁地归纳为:一大发现——脑矿;两大发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三大方式——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的民众教育方式;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五个结合——教育与实际生活、理论与实际、科学与农村实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与集体相结合。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在“定县模式”实践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四大教育”,实现“四大教育”的主要方法就是“三大方式”。所谓“四大教育”,就是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所谓“三大方式”就是实现“四大教育”的主要实施方式,一是学校式,一是社会式,一是家庭式,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三种方式相辅相成、相互结合、三位一体。

1. 平教思想“四大教育”的核心内容

晏阳初通过以往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和深入对中国乡村情况的调查中得出中国乡村的基本问题就是“愚”、“穷”、“弱”、“私”(宋恩荣、熊贤君,

1994)的四大基本问题,如何解决农民的“愚”、“穷”、“弱”、“私”这四大问题便是乡村建设的主要核心内容。由此,他提出了一整套解决这四大问题的方法,那就是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包括提高农民的识字能力与文化素养,为此,平教会分别组织了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平民戏剧的研究与实验;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生产;二是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增加生产的利益(宋恩荣,1992)^①。1929年,平教会具体设计出了一整套关于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实验方案,包括农民生计训练,合作组织制度,动植物生产改进等几个部分,力图为旧式农业经济的发展寻找一条可行的出路,同时,还对中国村镇工业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李景汉,1986);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平教会探索在乡村建立一套运用现代医疗技术的良好医疗制度体系,在定县建立了中国第一套以县为单位的保健制度,县设保健院,区设保健所,村设保健员,“使各村农民,都有享受科学医药治疗的机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起中外社会广泛关注,并被引入其他一些地区的乡村卫生改革之中;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宋恩荣,1989)^②。在公民教育方面,平教会主要进行了国族精神、乡村自治、公民知识教育及公民训练等四个方面的研究实验。

晏阳初认为通过“四大教育”使农民具备了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这样的农民才是晏阳初心目中农村社会具有现代化素质的理想公民,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民族再造的使命(张颖夫,2009)。

2. 平教思想“三大方式”的实验

晏阳初在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的同时,又提出了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教育方式的实验。从二十年代起,乡村建设者们就总结了很多平民教育的理论和经验。以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几乎是每一个乡建实验区都采取的方式。

学校式教育以文字教育为主,注重于工具知识之传授与基本训练,注重于个人的教学。包括了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除文盲实施方案、妇孺教育、师资训练等几方面的工作。此外,平教会在设立妇女平民学校及乡村幼稚园方面,也做了大量

实际工作,使乡村妇女教育与幼童教育有了初步的基础(宋恩荣,1989)^③。

社会式教育主要是解决农民尤其是平民学校毕业生的再教育问题,其中心组织是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简称“同学会”)。社会式教育的实施以讲解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教育的方法为主,注重团体的共同教学。

家庭式教育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欲改善中国的生活方式,必须从家庭做起。家庭式教育的目的,一是要扩大家庭的责任感,弥补学校式与社会式教育偏重青年农民的不足,将教育进一步推及家庭中主妇、老人和儿童,实现“家庭社会化”,二是使家庭每一成员均有机会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民。

二 凉山州开展扶贫工作的现状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扶贫攻坚难度大的特困地区,贫困集中连片状况至今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凉山17个县(市)中有1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占全省的30.6%,县县相连的贫困区域达4万平方公里。按2300元国家扶贫新标准测算,四川省确定的凉山州贫困人口达107.67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3.75%。至今,全州1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已分别纳入了国家、省乌蒙山片区和四川藏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凉山州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难度非常大,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一)凉山州开展扶贫攻坚工作的历程

建州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1978年以后,国家在民族地区实施扶贫开发,1984年,凉山的布拖、金阳、美姑、昭觉县就被列为国家半农半牧贫困县。到了1986年,我国的扶贫工作全面正式的启动,在1986年~1994年间,国家首次划出273个“国家贫困县”,凉山州17个县、市中的昭觉、美姑、金阳、布拖、雷波、喜德、普格、盐源、木里、冕宁、越西、甘洛12县,先后被列为国家和省定贫困县。凉山扶贫也于1986年正式开始,从那时起,凉山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有标准的扶贫攻坚工作。

总的来说,从1986年算起,凉山州扶贫攻坚工作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性阶段。

第一阶段:解决生存阶段。根据1986年中央政府第一次确定的国定贫困县标准^④,凉山州当时有四个国定贫困县,六个省定贫困县,一个州定贫困

县,贫困县集中连片区域占4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州面积的67%,贫困人口占四川贫困总人口的17.7%。贫困县中200元以下的极贫困户25339户,126699人。其中,80%的农牧户只有一间房,60%左右的农牧户无床无灶。418个乡镇中不能通车的乡镇有177个。

针对这种贫困状况,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凉山州按照当时国家制定的以解决人类基本生存为目标的“二六指标”进行扶持,即:让贫困人口达到年人均纯收入200元,年人均粮食600斤。在1987年至1992年期间,凉山州根据开发式扶贫工作方针,向彝区贫困户提出了“三亩地”^⑤建设;在半农半牧区坚持“白色革命”和“绿色革命”^⑥相结合的道路;对坡耕地进行“坡改梯”,减少水土流失,以保水、保土、保肥来提高农作物产量。采取“种、养、加、采”的扶贫开发方式,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解决温饱为中心任务,使260万绝对贫困人口初步解决温饱。76.14万建卡贫困人口中98%越过“二六”温饱线,贫困人口数量也降低到1994年的210万。

第二阶段:稳定温饱阶段。在1994年至2000年的“八·七”扶贫攻坚期间,按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四川省七一一八扶贫攻坚计划》,全州大力实施《凉山州七二一〇扶贫攻坚计划》,全州先后实施了稳定解决温饱的“五·八”指标,即农民人均纯收入500元、粮食400公斤。

1993年,州委、州政府在坚持项目开发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移民扶贫办法。在其后七年里,政府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基本上围绕着“移民扶贫”、“形象扶贫”、“百乡千村扶贫”工程为重点的互为联动、上下联动的扶贫开发方式进行。集中力量狠抓了“五个一”^⑦建设,实施了“五大扶贫工程”,稳定解决了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和贫困村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问题,到2000年底,凉山州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93年底的210万人减至40万人,平均年减贫25万人左右。其中,11个国定、省定贫困县的建卡贫困户由85.3万人减至24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也由63.63%下降至17.3%。贫困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也由1994年的401元增加至2000年的939元,粮食占有量从427公斤增至461公斤。该时期11个国定、省定贫困县整体上实现了基本解决温饱的政府反贫困阶段目标(伍精华,2002)。

第三阶段:追赶小康阶段。这一阶段(从2001年至2010年),全州17个县市中有11个县纳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188个村纳入重点扶持的贫困村。2000年底,全州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1000元

以下的低收入贫困人口有169.28万人。

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年)》,凉山州大力实施《凉山州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年)》。10年间,州委、州政府坚持把加快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把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头等大事,全力推进“八大扶贫工程”、“十大民生工程”建设,坚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原则,大力实施“统筹型、捆绑式”扶贫开发,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州贫困人口从2000年底的169.28万人降至2010年的54.21万人(老标准);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1361元增加至2011年的5538元。2003年至2010年,全州累计解决14.1万户贫困农牧民“三房”改造任务,受益群众63.63万人。累计完成新村扶贫建设1188个,完成移民扶贫1.3万户、5.85万人,完成271所乡镇中心校和161所乡镇卫生院改扩建任务。

从2010年开始进入扶贫攻坚的第四阶段。自2010年以来,国家和四川省相继启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和《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实施,涵盖大小凉山地区在内的乌蒙山区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四川省委、省政府制定并通过了《加快推进彝区跨越式发展的意见》和《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规划总体思路》及十个专题方案,国务院协调小组指导编制《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试点规划》,这些指导新十年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及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为大凉山综合扶贫开发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0年8月,省政府启动实施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凉山州以彝家新寨建设为重点,规划总投资500.30亿元,2010年完成投资33767.65万元,2011年完成投资384695.20万元,2012年计划投资797392.53万元,建成彝家新寨381个,覆盖贫困群众29670户,使14.84万人彻底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二)凉山州的扶贫政策与扶贫模式

1978年开始,国家在民族地区实施扶贫开发。1986年以后,凉山州17个县、市中的昭觉、美姑、金阳、布拖、雷波、喜德、普格、盐源、木里、冕宁、越西、甘洛12县,先后被列为国家和省定贫困县。凉山扶贫正式开始,国家对其实行了一系列较一般贫困地区更为优惠的政策。经过20多年的调整,现有的扶贫开发优惠政策主要包括(郭佩霞,2007):(1)对缺衣少被的严重困难户赊销布匹和絮棉;(2)对贫困县不分配或少分配国库券和其它债券;(3)增加贫困地

区乡镇企业平价汽油、柴油供应;(4)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5)给予农用物资分配比例照顾;(6)重点贫困县标准照顾;(7)增加并优先安排农业投资、教育资金、以工代赈、温饱工程等扶贫资金和物资,在分配比例上予以照顾;(8)对民贸企业给予低息、低税、价格补贴照顾;(9)对贷款还款期限予以照顾;(10)规定贫困县上交税收超基数部分全部留县;(11)对交通建设给予资金扶持;(12)对民族贫困地区的科技人员给予补贴;(13)实施“以工代赈”计划;(14)实施推广以玉米和地膜覆盖增产技术为中心内容的“温饱工程”计划;(15)设立扶贫贷款、少数民族温饱资金,安排牧区扶贫专项贴息贷款、贫困县办企业专项贷款。

近三十年来,凉山州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创造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扶贫模式,如1996年初“百乡工程”;1997年将“百乡工程”改为“百乡千村”工程和形象扶贫工程;2001年9月开展的百乡教育扶贫工程;2003年的“三房”改造扶贫工程;2006年推进的“五大扶贫工程”;2010年试点建设彝家新寨等等。结合州情创新扶贫机制,大力实施“统筹型+捆绑式”扶贫开发。认真落实各项专项扶贫工作,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就业促进等专项扶贫工作模式,在扶贫开发中,突出基础设施、产业培育、民生改善、公共服务配套四个重点,大力实施八大扶贫工程。把加强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扶贫攻坚的先导工程,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的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面貌。

(三)凉山州贫困地区落后的主要根源

历届凉山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率领全州人民与贫困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经过20多年的努力,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面得到遏制,民生不断改善,地方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社会环境制约等原因,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按2300元国家扶贫新标准测算,四川省确定的凉山州贫困人口达107.67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3.75%。在新的扶贫标准下,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对比,大凉山普遍贫困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由于凉山80%以上的彝族主要居住在二半山、高山区^⑧,该地带是彝族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带,超过一半的建卡贫困户分布于此。因此,在分析和探讨其贫困根源时,相应的把地域差异纳入分析视野。

1.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

凉山州境内地貌复杂多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高山、深谷、平原、盆地、丘陵相互交错,平均海

拔1800米以上。凉山州贫困人口聚居地主要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等地区,特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海拔26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和陡坡深沟地区。

高山区的生存环境属于典型的“不适人居”型。山高坡陡谷深、气候严寒多变、积温不足、耕地稀少、土质瘦瘠、灾害频繁等地理特性尤甚于二半山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几乎空白,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无村小、无卫生所的贫困村比比皆是。因此,相对于低坝区插花式零星分布和二半山区连片式集中分布的贫困而言,高山区算是全面性的贫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属于贫困户,贫困发生率达到96%。由于生存条件过于恶劣,该地带脱贫人口稳定情况最差,稍遇天灾人祸就陷入贫困,每年返贫率高达20%以上。解决基本温饱问题是每年政府反贫困行动重点。

因此,从全州总体来说,贫困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等。

2.农村教育滞后,劳动力素质低

在全州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636067人,文盲率为19.31%,主要分布在贫困县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彝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偏低,农村劳动力人口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高。受环境影响,尤其是二半山及高山区彝族人口绝大多数人不通汉语,个体素质过低,亦无一技之长伴身。造成信息传递难,劳动技能差,经营能力弱,有的甚至连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的经营能力都不具备。因此才形成了农业科技含量低,科技推广难,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局面。

3.社会发育层次低,群体素质较差

1957年以前,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还处于奴隶制社会,藏族聚居区和一部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则处于封建农奴制度,出现了几千年的历史断层。贫困群众不仅表现为物质的匮乏,更表现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落后。旧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势力仍然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和农民家庭的发展。思想意识封闭,旧的东西很难改变,新的观念很难传播,越是落后贫穷的地方就越严重,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甚至半饥半饱也“安”的现象比较普遍。“吃得起苦,耐不了劳,宁愿苦熬,不愿苦干”,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三 凉山州扶贫攻坚工作的对策

面对凉山州扶贫工作的新局面,对二十多年来的扶贫工作进行检讨,总结经验,虽然都难免或轻或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不足之处中关键

的问题是忽略了人的因素问题,即对“人的现代化”问题重视不够。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农村社会发育程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从长远来说是阻断贫困文化传递的治本之策。通过对我国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借鉴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从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进行综合的应对。尤其是对于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来说,发展教育事业,弘扬先进文化,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移风易俗,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将是民族地区扶贫攻坚工作的重点难点。

(一)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晏阳初的“民族再造”思想即“人的现代化”问题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总根源,也就是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是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乃至国家国弱民穷的治本之法。教育服务于乡村改造,通过乡村的整体改造与建设来开发和实现人的无限潜力和弘扬人的个性,重建新人格。这种通过教育和在乡村改造过程中培养人民的创造力、组织力、建设能力的理论,是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的精华。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成为凉山州扶贫攻坚的治本之策。

1.对贫困地区的学生实行“教育移民”政策

确定了“贫困偏僻农村学生易地搬迁读书——职业教育——城镇就业”的思路(海南省教育移民联合调研组,2008),开辟教育扶贫的新途径,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条件特别恶劣的二半山和高山区的特困人口实行“教育移民”政策,以有效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扶贫、保护生态和促进就业的综合效应。此一政策可以通过在重点扶贫县试点开始,逐渐在全州铺开。“教育移民”的关键做法在于对移民学生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入学),费用基本全免。其次是与职业教育衔接,解决好学生的出路问题。为防止教育与就业脱节,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移民的关键环节。通过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实行“四免一补”政策(免除学杂费、住宿费、信息费、课本费、补助学生生活费)和联合办学等措施,促进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2.强化职业教育,开展劳务输出

晏阳初“四大教育”中“生计教育”的实践经验对当代发展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要注重社会性别敏感性和文化差异。培训内容上,在家畜饲养、经济林木种植、农产品粗加工、天然绿色植物采摘与保鲜、保护生

态环境和刺绣、民族服饰设计等基础上,高山区、二半山和低坝区的培训项目应该根据各自的产业结构而定,避免一刀切以提高技术适用性。在培训时间、地点、语言、方式上,根据高山、二半山和低坝区贫困人口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创新教育宣传方式,充分发挥学校式教育的优势。

3.加强先进文化的教育,促进现代公民人格的形成

彝族地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文化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人格及现代社会形成的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利轻义的财富观;厚死薄生、奢办婚事的消费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轻个人、重集体的社群观;重血亲、盲目排外的人际观;视农为本、轻商贱役的生产观;迷信方术、敬畏鬼神的宗教观;“等、靠、要”的消极度日观等等。这些代代相传的不利于发展现代商品经济的“贫困文化”(周怡,2003)所形成的保守性、专制性、宗教性、封闭性的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彝区商品性、竞争性、民主性、科学性、开放性的现代社会的形成。消除和减弱“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关键在于年轻一辈,特别是个体依赖性较强的青少年。因此,倡导彝文化现代转型需要突出对个体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如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同时,突出传媒功能和同辈群体功能,让先进文化冲击“贫困文化”。创新先进文化的传播模式,做好传统与现代间衔接、交融工作,倡导健康、良性的社会文化氛围。

4.创新现代教育模式,倡导现代文明新风

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贫困人口科学意识。在这方面,农业科普宣传与示范、农民夜校、“三下乡”活动、组织农民参观学习、职业培训等,都是很好的形式。在传播现代文明新风上,要充分发挥家庭式、社会式教育的优势,探讨符合地区特色民族特色的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相辅相成、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二)改善贫困地区物质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

在凉山州二半山、高山区等贫困连片集中区域,尤其是二半山区行路难、看病难、读书难、饮水难等问题仍然严峻,对彝族贫困户生存和发展造成最大威胁的又是住房、医疗、水利、交通、教育。重点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道路交通、学校教育、通讯设备、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加大力度继续推行“三房”改造、卫生扶贫、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建设和基本农田改造工程,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来改善贫困户的生存环境。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

时让彝族贫困人口自觉改造贫困文化,阻断和削弱贫困文化的传递和影响。

(三)开展创业扶持工程。

低坝区相当部分彝族贫困人口属于高山移民。由于投入有限和后续扶持政策缺失等多种原因,很多家庭陷入“移得动,稳不住”的尴尬境地。要消除低坝区移民贫困户的这种尴尬境况,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移民扶贫补助标准以降低贫困户的资金欠缺程度。在此基础上,针对移民户和低收入户开展创业扶持工程。创新适合民族地区的财政金融扶贫模式,发展无抵押小额信用贷款制度。

(四)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扶贫项目。

在低坝和二半山区农业发展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政府反贫困项目依托农业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特”、“优”绿色产业基地,重点扶持农田改造和“特”、“优”农产品的深度加工项目;创新农业开发的组织发展模式,优先扶持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开发,加快农村经济的规模化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地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带动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

(五)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解决特困人口的生存条件

在高山区和部分环境特别恶劣的二半山区,政府的反贫困行动以“救济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模式为主,围绕“种粮自养、牧林致富”为中心,因地制宜地重点开展“教育扶贫”“移民扶贫”、“生态扶贫”“牧林扶贫”和“外贸扶贫”五大工程;在此基础上,辅以“对口帮扶”为主的社会扶贫方式。

(六)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减低脱贫人口返贫率

凉山彝族地区吸毒贩毒问题极为突出,参与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很多彝族家庭因涉毒而家破人亡。凉山是四川艾滋病重点监控区。

毒品自20世纪90年代始便肆虐大凉山,大凉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美姑县和布拖县是吸毒贩毒的重灾区。1995年6月,凉山首次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到2010年年底15年间,凉山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21565例。拥有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州实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这意味着每百人中就有一位感染艾滋病。

毒品泛滥与贫困交织是一种必然的社会演化现象,严重影响政府的反贫困行动,是贫困地区返贫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抓住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及与艾滋病防治试点工作开展机遇,加强禁毒防艾工作,倡导文明社会新风,创造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安全稳定环境。

总之,在新的扶贫攻坚阶段,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提高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主攻方向,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连片开发、整体推进,禁毒、防艾、职教、扶贫、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五管齐下”,“治穷、治愚、治病、治毒”相结合,“两化”互动带动“三化”联动,突出教育文化、基础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配套,积极实施“彝家新寨”工程、“十项民生工程”等扶贫攻坚,一手抓安宁河谷地区率先发展,一手抓大凉山和木里藏区扶贫攻坚、跨越发展,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农村建设要义》,《晏阳初全集》(二),第41—42页。
- ②《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晏阳初全集》(一),第248页。
- ③《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全集》(一),第268—269页。
- ④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人均粮食在600斤以下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 ⑤即扶持贫困户建设一亩高产粮田、两亩找钱地。
- ⑥“白色革命”指发展地膜玉米;“绿色革命”指粮草轮作。
- ⑦“五个一”指的是一亩高产稳定田,一分找钱地,户均一项稳定的养殖业,户均转移一个剩余劳动力,户均一个小学毕业生。
- ⑧海拔高度1200m~1800(2000)m称为低坝区、1800(2000)m~2500m为二半山区、2500m以上为高山区。
- [1]潘家恩,杜洁.“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资源与矛盾[J].开放时代,2011,3.
- [2]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M].长沙:湖南岳麓书社,2001.
- [3]郑杭生,张春.晏阳初:平民教育从中国到世界的历程[J].江苏社会科学,2004,2.
- [4]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
- [5]周建波,马亦欣.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2.
- [7]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M].王利文,于占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8]阿玛蒂亚·森著.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
- [9]周丽莎.基于阿玛蒂亚·森理论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模式研究——以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1,2.
- [10]姜荣耀.试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特点[J].四川师大学报,1995.
- [11]宋恩荣,熊贤君.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 [12]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 [1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 [14]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 [15]张颖夫.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基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视角[D].西南大学,2009.
- [16]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 [17]伍精华.凉山的变迁[M].民族出版社,2002:98.
- [18]郭佩霞.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
- [19]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 [20]凉山州2001—2005年扶贫规划[N],凉山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日期:2004/06/14.
- [21]王云,李清波,徐登林.凉山州十年扶贫成就掠影[N].四川日报,2012/04/10.
- [22]海南省教育移民联合调研组.海南省“教育移民”情况的调研报告[J].琼州学院学报,2008,2.
- [23]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J].社会学研究,2003,3.

Research on the Yanyangchu's Civilian Education Thoughts and Liangshan Poverty Alleviation Countermeasures

JING Zhi-ming, WANG Tang-yao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state of Yanyangchu's civilian education thought and hi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target, the core content and education mode, digs out its historical mi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flat teaching thoughts and township building motion target "national reengineering", explores the "big four education" core concept and the "three big education mod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flat teaching thoughts and township building movement, and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the new peri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present status, result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poverty reduction mod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discusses the reason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difficulty in backward area in liangshan. Taking Yanyangchu's civilian education thought and the practi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in view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iangsha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develop education cultural undertakings as the main line, and highlights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and specific measures of education cultur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ublic service supporting.

Key words: Yanyangchu; Flat Teaching Thought. Liangshan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周锦鹤)